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超越及其世界意义

于成文, 王 雪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京 210044)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世界现代化的多样性特征、凸显中国特色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跃迁, 只有在与既有现代化模式的比较中, 才能彰显其独特优势。中国式现代化在“扬弃”现代化不同模式的基础上, 以人民逻辑实现对西方式现代化资本逻辑的超越, 以正确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态度实现对苏联式现代化的超越, 以跨越“依附陷阱”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超越,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为“全球南方”现代化提供了新范式。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西方式现代化; 苏联式现代化;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6) 02-0001-11

The triple transcendenc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its world significance

YU Chengwen, WANG Xue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based on the diverse feature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and highlight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leap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modernization, and its unique advantages can only be highlight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existing modernization models. On the basis of "sublating" different modernization models,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surpassed the capital logic of Western-style modernization with the people's logic, has surpassed the Soviet-style modernization by correctly treating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has transcended the moderniz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overcoming the "dependency trap".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created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opened up a new real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provided a new paradigm for moderniza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stern-style modernization; Soviet-style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世界现代化发展普遍规律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点之一在于把握其与西方式现代化、苏联式现代化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关系。目前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与既有现代化模式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

个方面: 其一,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学者们认为, 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超越了西方政党的资本属性与利益集团化倾向, 避开了西方民主治理不善的困境, 实现了对资本的驾驭和管控^[1]; 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为全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

代化模式^[2],不仅在理论上拓展了现代化的内涵,更在实践上摆脱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路径依赖,影响了世界现代化版图和世界历史格局^[3]。其二,中国式现代化与苏联式现代化的比较。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与苏联式现代化存在继承关系,又在经济、生态和对外关系等方面实现了对苏联式现代化的超越^[4]。其三,中国式现代化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关系。学者们认为,相较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却普遍陷入各种困境之中,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和比较研究^[5];中国式现代化从政党组织力量、治理方式、现代化选择视野等层面,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选择迷思上的超越^[6]。

尽管学界已对中国式现代化与既有现代化模式的比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相关研究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是现有研究比较中西现代化的相对较多,对中国式现代化与苏联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之间关系进行比较的相对较少,特别是从整体上将中国式现代化与既有现代化模式进行立体比较仍显不足;二是比较研究的内容较为单一,许多问题没有充分展开。鉴于此,本文在世界现代化的时空场域中把中国式现代化与既有现代化模式进行全方位整体性比较,以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与世界意义,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一、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以暴力开路、以工业化为杠杆,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并将资本主义组织体系拓展到全世界,形成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7],所以,西方式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资本至上成为基本的价值准则。在“什么是现代化”的问题上,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8]的重要论断。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至上”理念内化于中国发展的底层逻辑之中,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性的根本所在。在中国,人民是推动现代化的主体和决定性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改写了传统的自由主义全球化叙事,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

(一)以人民至上超越资本至上

西方式现代化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化,其终极目标是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因而造成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严重损害了社

会公正和公平。而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民至上的发展逻辑,致力于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维护少数资本家利益的资本至上逻辑。

回顾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历史,“人”被视为为实现资本增殖的工具,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尊严和切身利益得不到维护,劳资对立、贫富悬殊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始终。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发展“一边是世袭的富有,另一边是世袭的贫困”^[9]。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配是按“资”分配,剥削、不平等社会现象产生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产生于资本家凭借雇佣劳动制度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所以,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消灭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

中国共产党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致力于现代化实践成果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带领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中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指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这种分配制度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其目标是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表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1]^[41]。中国式现代化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12],扬弃了资本主义只注重单向度的积累而忽略人的全面发展之现象。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突破了西方人本主义对人的“抽象性”理解,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成功规避了西方式现代化资本至上的陷阱,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发展道路。

(二)以共同富裕超越两极分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3]^[22]这一论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式现代化在制度层面的根本区别。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开启了现代化进程。西方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较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也产生了诸多问题。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11]426-427}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悬殊引发的社会矛盾，但这种过分强调社会福利保障作用的发展模式违背了“量入为出”的基本法则，带来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放缓或停滞等问题，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富裕”和“共同”目标的统一。

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有所不同，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一些国家试图复制西方式现代化发展模式，导致自身发展深陷泥潭和陷阱。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别于西方式现代化发展模式，是一种创新的发展模式。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14]。这一制度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旨归，要求对社会资源进行均衡分配，注重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努力使现代化发展成果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资源分配的巨大不平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两极分化的逻辑。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共同富裕不仅是复兴的标志，也是复兴的动力和条件。“十三五”期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十四五”时期，中国共同富裕已经取得新进展，到2035年，共同富裕将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2050年将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三）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超越物质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人民逻辑”，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价值遵循，从人类解放的高度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资本逻辑”下形成的物质主义价值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自由相比，西方式现代

化推崇的个人理性和自由并未使人真正摆脱“依赖关系”，只不过是“相互依赖”变成了对物的依赖。“物质主义”并非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而是特指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强调物质财富、物质享受至上的价值观念。在这种理念影响下，人们往往将物质占有量、消费能力视为衡量成功与幸福的核心标准，过度关注物质层面的获取和积累，而相对忽视精神、情感、道德、文化等非物质领域的发展。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物质主义，从根本上重构了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和交往关系。其一，在人与世界的关系层面，资本将自然对象和社会产品都转化为可量化的交换价值，使原本具有丰富使用价值的具体物质存在沦为抽象的价值符号；其二，在人与自身的关系维度，资本逻辑消解了人的多元价值追求，将人的本质力量简化为单一的劳动力商品属性；其三，在人与人的关系领域，资本使社会交往异化为纯粹的利益交换，情感联结和伦理关系被冰冷的计算理性所取代。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15]402-403}，代之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15]403}。西方式现代化以“物”为中心消解了人的价值，使人遭受了“内在破坏”，陷入精神堕落，因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便无从谈起。

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力量是人。如何克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缺陷，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422}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不限于物质生活的改善，还需要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和精神需求的有效满足。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将儒家“义利之辨”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在发展模式上实现了两方面创新：在制度层面，通过混合所有制经济抑制了资本逻辑的无序扩张；在文化层面，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建了物质追求与精神提升的辩证关系。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3]22}，追求“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13]23}，为破解物质主义困境提供了重要的东方智慧。

（四）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西方式现代化由于资本的增殖与扩张本性，极力推崇全球争霸战略，试图将其他国家纳入自己的

发展框架中,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支配—从属”结构与依附性发展,严重危害了其他国家的发展利益。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始终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站在全球视野回答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时代之问,实质上也是“人民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之处。

在“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框架之下,其全球争霸战略通常以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为特征,目的是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甚至不惜危害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发展权益。由于资本的扩展本性,它除了对内主宰整个社会之外,也必然对外进行扩张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掠夺。从历史上看,走向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普遍采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来干预其他国家发展,并通过各种手段角逐全球主导地位,国强必霸似乎成了一条难以逃脱的历史路径。从西班牙、葡萄牙称霸世界到英国建立“日不落帝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再到“冷战”时期美苏对峙,尽显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奉行的全球争霸战略。因此,西方式现代化伴随着对外侵略和殖民掠夺,在那里,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是常态,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这充分显露了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弱肉强食与霸权主义的真面目。至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以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文明优劣论”“种族优越论”来排斥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和民族,竭力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并没有履行其促进全球公平正义的责任;相反,这些国家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持续激化国际冲突,并从中攫取不正当甚至违背道义的经济利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它根植于“人民逻辑”,旨在超越西方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揭示了国强必霸并非人类迈向现代化所普遍遵循的法则,为全球现代化发展开辟了一条顺应人类文明进步趋势的新道路。在实践中,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发展机遇和实在利益;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开展周边外交,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无条件支持后发国家的发展事业,尊重非西方中小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等等。在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16],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人

间正道,对“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给出了中国方案。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苏联式现代化的超越

苏联式现代化作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显著特点就是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种模式的存在和发展对于现代化的开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它保证了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保证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也对世界社会主义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这种模式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许多弊端,如政治上过分集权,缺乏民主与法治;经济上统得过死,管得过严,缺少效率和效益;思想上强求一律,听不得不同声音,缺少独立和自由。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正确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并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效规避了苏联式现代化的弊端,在民主制度、经济体制、指导思想等多个维度成功超越了苏联式现代化。

(一)以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高度集权政治体制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苏联政治体制的最大缺陷——权力高度集中、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党和人民意志之上的高度集权体制,走出了一条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现代化之路。

坚持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之初,就十分强调党内政治生活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观点。从理论上说,苏联共产党完全是一个民主性质的政党。在《苏联共产党章程》中明文规定,党组织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违反党内民主的现象在党内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实际的民主实践与民主理论的宣传存在较大差距。苏联之所以解体,是因为偏离了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以高度的政治集权损害了民主,使“苏共领导干部从‘人民公仆’蜕变成了‘人民的主人’”^[17]。

由于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过于强调国家的专政职能和政权巩固,片面强调党的统一,忽视民主和法制建设以及人民群众的民主等合法权利,苏联逐步产生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局面,个人专权现象也由此产生。随着权力集中,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功能逐步削弱;权力监督无法正常开展,监督机关成

为一种摆设，失去在维护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上的作用。在干部选拔上，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取代选举制。高度集权的直接后果，就是党内民主、社会民主缺失，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未能健全完善。虽然此后的苏联领导人采取了一些措施加以纠正，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党内缺乏民主的问题。他们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却又大搞自己的个人迷信，党内民主政治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异，政治危机日益严重。

中国共产党吸取苏联党内民主与集中相对立的教训，以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苏联式现代化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包含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内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始终面向人民的公共意志，真正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制度规范，才能得以科学、合理、顺畅地运行。在民主集中制中，党的领导人的行为在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而受到限制，同时对于捍卫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其权威亦得到相应的维护与尊重，有效避免了领导人的个人独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它确保了党组织在决策过程中能够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同时也尊重少数人的意见。民主集中制强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是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和特点得到充分发挥的保障。贯彻运用民主集中制，既可以提高决策的效率，又可以避免发生重大失误甚至颠覆性错误，从而更好地把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势转换为国家治理效能。贯彻运用民主集中制，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引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与关键。

（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把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和优势。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了苏联只注重政府作用而忽视市场作用的弊端。

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体制是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而作出的一种预测。他认为，人类走出资本主义时代后，将进入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时期。联合体内的社会生产将是自由人的联合劳动，整个社会将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以代替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按劳分配将代替按资分

配。可以说，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的经济体制是一个商品已经消失的产品经济模式，而商品经济也被马克思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之一，计划经济则长期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生产力比较发达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会先开展社会主义实践，而事实上却是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国家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且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所以，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经济体制的思想观念在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就更为不可或缺。

不可否认，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初创时期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它毕竟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积极作用发挥的时空十分有限。随着时代背景和发展环境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最终演变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的旧体制障碍。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对企业进行严格的控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难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运行，科技创新与实际生产需求脱节，生产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导致整个经济体系活力不足，严重阻碍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现代化的推进。

从毛泽东的“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再到邓小平的“走自己的路”，中国逐步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苏联模式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形成的世界上第一个定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看到了苏联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更加坚定了要“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以苏为师”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信心。由于苏联模式排斥市场的作用，其弊端日益显现，毛泽东又提出“以苏为鉴”的命题，号召打破对苏联的迷信。“以苏为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但是，改革开放前，我国总体上实行的依然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遭遇了经济增长乏力与资源分配失衡的双重困境，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显然难以适应加速经济发展的需求，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面对当时遇到的“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率先突破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不是直接反映社会基本制度性质的范畴。党的十四大明确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束了改革开放以后长达 14

年的计划和市场之争。随着改革的深入,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不断深化,逐渐形成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8]的定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19]的论断,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这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完全摒弃市场机制作用的苏联式现代化的超越。

(三)以坚持守正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超越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并非僵化的教义,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循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现代化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指导现代化实践,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成功超越了苏联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与实践统一,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是苏联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僵化和机械应用方式,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结论的教条式理解,忽视了理论的发展性和适应性。这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这种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工作方法导致了苏联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体制的僵化。在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斯大林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经济建设上表现出明显的急躁冒进,在政治上过分强调权力的集中,在所有制和经济体制上,片面坚持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僵化观点,追求所有制结构的单一化,忽略市场机制的价值。同时,在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解上,斯大林僵化地坚持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没有充分考虑战后科技革命对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斯大林时期形成、确立的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苏联数十年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一直居于支配地位,教条主义者构筑的理论不能及时而准确地反映不断变化的现实,不能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现实问题,从而产生了“信任危机”,导致苏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就从根本上摧毁了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使党和国家走向失败的歧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论是僵化地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还是偏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都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严重后果,教训十分深刻。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守正创新。也就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结合具体实际情况,推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以中国化时代化的形态指导着中国人民的“救国、兴国、富国、强国”^[20]的实践。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当年就意识到,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出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的作用。紧跟时代变化进行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突出特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紧跟时代的创新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为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在革命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囿于条条框框,积极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先河,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建设和改革的年代,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理论创新的优良传统,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本本,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此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根本上实现了对苏联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超越,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思想保证。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超越

中国现代化的开启历程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都是被迫卷入资本主义现代化浪潮中的。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指望通过其他国家的“恩赐”“援助”“扶持”来实现,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现代化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把本国现代化的命运绑在西方大国的战车上,对别国模式照抄照搬,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在资源配置上搞“单打一”,不仅丧失了独立性,还丧失了发展机遇,落入停滞和动荡的泥潭。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自己的路,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多重超越,成功跨越了“依附陷阱”。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破解了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世界难题,为沉溺于西方式现代化的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智慧,进而带动更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崛起,实现世界现代化的多模式发展。

(一)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超越照搬别国发展模式

现代化是发达国家开创的世界历史洪流,每一个国家或早或迟都要涌入这一进程。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会面临既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二元难题。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通常会将西方现代化模式视为范本,依赖他们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简单照搬和模仿其发展道路,这不仅未能使其实现现代化反而在西方国家构建的国际体系中丧失了自身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西方国家。这种依赖关系源自发达国家过去长达数百年的殖民剥削和压迫。时至今日,发达国家依然极力向发展中国家兜售其价值观和发展理念,既试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自己的利益体系,又在各方面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封锁,阻碍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以防其威胁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不平等的发展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由于资金短缺问题突出而让渡出了部分经济主权,在政治领域由于受到自由主义思潮的左右而机械模仿西方政治架构,导致国家治理缺乏权威性和效率,同时也失去了独立施行外交政策的自主性。

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破解了发展中国家既要实现现代化又要保持国家独立性的世界难题。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1]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这也是我们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中国在大数据、人工智能、金融科技、5G、高速铁路等领域取得的一系列体现自主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卓立世界舞台。在国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以避免沦为其他国家的附属。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国家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以统筹发展和安全超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

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既要实现快速发展又要保持社会安全稳定的发展难

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国家无批判地借鉴西方国家发展模式以追求经济增长和变革,导致国内外矛盾加剧,并引起多国频繁爆发政治冲突与战争,而欧美国家也趁机插手他国事务、干涉别国内政。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普遍呈现出一种特征,即政治秩序混乱、军事政变屡现、国家持续动荡。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其社会的安全性密不可分,而社会安全稳定依赖于有效的国家治理。在追求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政治局势往往不稳定,这种动荡常常源自民主化浪潮下新兴力量与传统势力之间激烈的思想碰撞和权力争夺。在这一过程中,改革派与守旧派的较量尤为激烈,导致政府领导权频繁而迅速地交替。比如,埃及政权自1952年起经历多次更迭,2011年民众抗议导致穆巴拉克下台,此后埃及政治动荡不断,治理体系不稳,现代化发展受阻。

中国成功破解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既要实现快速发展又要保持社会稳定的世界难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面对复杂多变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并将其写入党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2025年4月30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通盘考虑内外部风险挑战,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安全能力,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22]

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同步推进。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深入贯彻改革开放政策,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高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同时,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基本权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有效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在国际上,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断完善参与国际和区域安全合作的机制,推动建设有关领域安全治理新机制新规则,为解决全球问题和挑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国家安全也得到全面加强,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三)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超越资源配置“单打一”

发展中国家起步晚、经济基础薄弱,难以通过自我积累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着既要利用资本又能驾驭好资本的难题。从理论上讲,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作为落后一方,如果在与发达国家交往过程中,能够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吸收利用外资,学习其管理经验,是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然而在实践中,发展中国家既面临利用资本的难题,更会出现单纯利用资本的困境。其一,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大国集团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处于劣势地位。由于资金、技术和管理人才的缺乏,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通常处在下游,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发达国家的干涉、控制、剥削和掠夺。其二,发展中国家的外部依赖性高。由于国内资本不足,发展中国家将目光转移到国外,依赖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国际贷款。但是这种依赖性使得它们在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中极为脆弱,同时也受制于外国投资者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利益和要求。其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发达。由于金融体系不成熟,银行系统薄弱,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这限制了企业和个人获取资本的途径。其四,发展中国家制度建设不完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策不稳定、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健全都可能成为资本形成和利用的障碍。因此,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现代化不能靠“单打一”,既要积极利用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又要加强政府的作用,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要以公共权力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尤其是要防范国民经济命脉被外资操纵。

资本是市场经济的重要要素,它可以成为发展的手段,但发展资本本身不是目的。“中国道路是一条运用以国家权力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力量驾驭资本的现代化之路。”^[23]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国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又注重发挥政府的引导和调控作用,积极采取多项措施依法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其一,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运行,对各类资本的投资领域和项目进行有效监管,防止不良资本野蛮生长。其二,加强市场监管。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其三,教育引导资本主体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资本增值背后蕴含着资本主体的价值

观念。只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资本主体的精神追求,才能使其在重大的义利抉择中,将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统一起来,为资本注入价值理性。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辩证认识资本的双重作用,超越了“消灭资本”和“以资本为中心”的二元对立,开创出一条从跨越资本到利用资本,再到驾驭资本的现代化之路,既激活了资本“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4]等文明一面,又规避了资本无序扩张、资产泡沫等负面影响,让资本发挥了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促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四、中国式现代化三重超越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新图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多元现代文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打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桎梏,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开拓了光明前景;创造了世界现代化的新范式,为“全球南方”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是同野蛮、无知和愚昧相对立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文明形态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演进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以一种进步史观来看待文明的发展。他们认为,不论文明发展呈现何种形态变迁,但始终表现为在新的文明中对先前文明的反思与超越,并持续向前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汲取先前文明的精华,继承中华文明的传统,融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新形态,为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提供了新选择和新方向,具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由于其先发性,逐渐在世界上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基于此,西方文明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整个人类文明的象征,是所谓“历史的终结”。但是从实质上讲,西方文明形态是资本逻辑下的,奉行物质主义、人类中心主义、霸权主义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五个文明”协调发展,超越了西方现代文明“周期性经济危机、巨大的贫富差距、突出的精神文化矛盾、严重的社会分裂、紧张的人与自然关系等发展难

题”^[25]，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多重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26]。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了各种文明多元发展的现代化图景。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文明形态。在这样的文明形态中，壁垒、对抗、武装冲突和殖民剥削持续上演。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尊重国情、尊重发展的多样性，倡导“和而不同”，不仅保留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也为其他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中国式现代化用文明交流、互鉴的方式消除文明隔阂，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单一模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建设和谐美好的人类新秩序展现出独特的全球价值，为多元现代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新形态的人类文明是指引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如何避免重蹈西方式现代化和资本主义文明的覆辙，避免重陷其为发展中国家设置的现代化陷阱，同时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引领人类文明走向新的进步方向，是世界现代化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回应了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关切，其开创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超越了以资本逻辑为基本逻辑的西方现代文明，把“以人为本”的逻辑范畴从中国人民扩大到世界人民、从单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提升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从中国的永续发展延伸到整个人类的永续生存和世代发展，彰显了更广阔的全球思维和最高价值取向，为人类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并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有机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善于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在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体现，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的统一，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重大创新。在政治方面，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在经济方面，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文化方面，强调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在社会方面，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生态方面，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倡导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鲜活的内容。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立足国情与时代需求，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系统性重塑与升级——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创造性转化传统治理智慧，构建起一套涵盖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领域体制机制的现代制度体系。作为新时代中国发展优势的集中载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能够通过本土化改造适应不同国情，又以“中国之治”的实践成效为其他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制度模式提供多元参照，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的制度生命力。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提供新的借鉴。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化解现代化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取得了历史性、革命性、开创性的历史成就，树立了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范例，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更加光明的前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势日益凸显，逐渐破解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困境，为世界各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选择。

（三）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南方”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范式

现代化作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是世界各国追求的发展目标，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现代化的新范式，深刻回答了“人类如何走向现代化”这一世界性课题，拓展了“全球南方”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也为“全球南方”注入新动能。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全球南方”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逻辑下，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一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的影响。不少南方国家以西方现代化为样板，照搬其经

验,都不同程度陷入政治动荡、经济停滞、社会撕裂等困境,从而落入西方式现代化模式的窠臼。中国立足自身力量,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成功跨越了“依附陷阱”,证明了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就是走自己的路。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新时代以来“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鲜明对比,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选择^[27]。中国的现代化正激励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坚定自信、大胆前进,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让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广。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南方”注入新动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与南方国家的共同进步紧密结合,以实际行动促进南南合作与全球发展,展现出独特的责任意识与行动力。区别于西方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模式,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助力“全球南方”发展。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四大全球倡议”创新南南合作机制,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南方国家集体行动方案;中国在国际舞台始终坚定支持南方国家诉求,为南方国家争取气候变化融资、债务减免、技术转移等权益;在国际冲突与危机中,中国始终坚持不干涉内政、劝和促谈原则,为“全球南方”注入和平力量。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必将回馈国际大家庭。”^[28]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中国将继续为“全球南方”创造新机遇,同南方国家一道书写人类现代化新篇章。

五、结语

人类现代化是由许多不同模式的现代化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实现现代化,关键是找到符合国情、符合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道路。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演进来看,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式现代化一条道路,从单一模式现代化结构向不同模式现代化并存的结构转换具有客观必然性,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积极回应了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关切,实现了对不同模式现代化的整体超越与创新,创造了实现现代化的全新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全方位地克服了西方式现代化的顽瘴痼疾,打破了只有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神话,宣告了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历史观的破产,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的重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反对照搬其他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有效规避了苏联式现代

化的弊端,从多重维度成功超越了苏联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不走“依附”发展之路,又反对“脱钩断链”,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超越了传统工业文明的时序推进,开辟了“并联式”发展新路径,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多重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全球南方”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方案,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 [1] 孙帅. 比较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价值研究[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2, 26(6): 63-69.
- [2] 曹普.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渊源、逻辑构成、战略部署和世界意义[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4(5): 83-90.
- [3] 王辛刚. 比较视阈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4(6): 1-8.
- [4] 刘明明. 中国式现代化与苏联式现代化: 比较·超越·镜鉴[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4(5): 24-33.
- [5] 宋学增. 比较视野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症结和启示[J]. 科学社会主义, 2024(6): 143-150.
- [6] 张占斌, 王瑞. 比较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与超越[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4(2): 47-55.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9.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594.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36.
- [10]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50.
- [11] 习近平. 习近平经济文选: 第1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5.
- [1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64.
- [1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14]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8.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68.
- [17] 左凤荣. 中国学界苏联剧变问题研究史回眸[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2(2): 38-45.
- [18]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5.
- [19]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6.

- [20] 秦宣.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分期的多维解读：以党的文献为依据[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1, 35(3): 20-30.
- [21]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3.
- [22] 适应形势变化 把握战略重点 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N]. 人民日报, 2025-05-01(01).
- [23] 唐爱军. 中国道路：超越资本现代性[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7(3): 23-31.
- [2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927-928.
- [25] 周文. 再论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J]. 求索, 2023(5): 5-16.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7.
- [27] 习近平.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J]. 求是, 2025(1): 4-19.
- [2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222.

(责任编辑：陈丽琼)